

中图分类号: B5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50(2012)01-0029-08

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研究

付畅一¹, 余源培²

(1.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中心视阈是对所有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以所有权为批判对象, 切中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性维度,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 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与可能。但是, 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他的“系列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化。研究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 对于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 蒲鲁东; 经济哲学; 所有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近年来, 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 以及马克思对蒲鲁东实现的超越则鲜有论及。本文拟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作一些剖析, 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一)

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发端于《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1839年)和《什么是所有权》(1840年), 发展于《论人类秩序的建立》(1843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 正式形成于《贫困的哲学》(1846年)。在以上论著中, 蒲鲁东通过对所有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构建起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体系。

对所有权的批判是蒲鲁东经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在《什么是所有权》中, 蒲鲁东鲜明地提出, 劳动不能说明所有权的来源, 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主要观点“所有权的来源是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互相背离。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 第一次把理论研究从流通转到生产,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劳动价值论”。他们都企图通过劳动来说明所有权。蒲鲁东指出, 这种对所有权起因的解释, 无法说明不劳而获者的所有权, 也不能说明一定时间之内的劳动何以能够产生永久的所有权。如果说劳动是所有权的来源, 那么, 结论自然就是所有权应当是劳动的报酬, 所有权的享有应该限于实际占有的期限和劳动的期限。这一结论无疑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主张, 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合乎自然的、绝对

收稿日期: 2011-11-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0FKS003); 复旦大学“985”三期项目

作者简介: 付畅一(1976—), 女, 辽宁葫芦岛人,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 哲学博士;

余源培(1938—), 男, 江苏泰兴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的、永恒的所有权制度相矛盾。

蒲鲁东进而指出,所有权是对平等的侵害,是造成社会中诸多灾难的根源。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设定的商品交换是自由人之间在自愿基础上的平等交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蒲鲁东认为,社会现实生活交换中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那个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而烤出一大堆面包、为了可以住在马房里而去建筑一座宫殿、为了能穿上破衣烂衫而去织造最名贵的布匹、为了自己省掉一切而生产一切的文明世界中的工人,是不自由的”。^①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商品的价值是由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所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量所决定,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蒲鲁东尖锐地指出:“既然一切交换的条件是产品的等值性,所以利润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合乎正义的。”^②那么,现实中以利润形式存在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呢?蒲鲁东对此的解释是:“工人们的劳动已经创造了一种价值;因而这种价值是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既没有出卖这种价值,又没有加以交换;并且您,资本家,您也没有花什么力气来争得这种价值。”^③工人创造的财富又是如何落到资本家的口袋中去的呢?是资本家通过偷换工资概念实现的。蒲鲁东揭穿道:“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工人什么也没有出卖……在您那方面,即使不说是盗窃和诈欺的话,也至少是错误和乘人不备。”^④此外,资本家还侵吞了工人集体力量所产生的产品的价值,蒲鲁东形象地比喻道:“两百个卫兵在几小时之内把吕克索尔的方尖石塔竖到它的基石上;假如只是一个人,让他做上二百天,他能办得到吗?”^⑤显然,对于工人因劳动组织和协作而产生的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以任何报酬。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这样剥削工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所有权。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产生所有权的说法,完全颠倒了事实,所有权是对劳动平等的侵害。非但如此,所有权还是造成社会中诸多灾难的根源,“竞争、利害关系的孤立状态、垄断、特权、资本的积累、独占的享受、职能的居于从属地位、个体生产、利润或收益的权利、人剥削人,或者把这种种情况汇总在一个名称之下,就是所有权,乃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⑥

蒲鲁东还初步触及所有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他从对自然法权观念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所有人生而平等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法权设定,因为它恰恰以“财富和等级上的不平等为前提”。^⑦1789年法国革命是所有权历史性的最佳说明:“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就是说,在封建主义时代,财产的价值是由所有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而定的。”^⑧它表明所有权并不是天生的权利。既然现实的资产阶级所有权是和永恒、绝对的平等观念相矛盾的,那就只能证明它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不可能长期存在,永恒绝对的平等理性最终将导致不平等的资本世界的毁灭。蒲鲁东指出:“我证明所有权是荒谬的、毫无价值的,它在它的名词中包含着矛盾,它导致无数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和不可能的事;总之,它是事实上的,但它是不可可能的。”^⑨在这里蒲鲁东已经接触到所有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沿着正确的道路深入探究下去。

《什么是所有权》发表之后,蒲鲁东进而感到有必要从经济学和哲学方面,对所有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持续探索的结果,集中反映在1846年写成的《贫困的哲学》之中。如果说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那么在《贫困的哲学》中这种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自觉努力。对于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蒲鲁东是这样阐释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就是逻辑学。它是社会的代数;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代数的实际运

用”。^⑩“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⑪。社会贫困问题之所以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脱节”。

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经济现象实证性的解读方式进行了批判,力图透过纷繁的经济现象,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在他们(指经济学家。——引者注)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⑫他坦言自己并不把近百年来人们正式名之曰“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自相矛盾的理论视为科学,因为这些理论不过是一部自古沿袭下来的关于所有权的法典或惯例的集成,对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身,政治经济学从未提出过任何疑问。就此而言,蒲鲁东不无理由地认为:“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让·巴·萨伊所留传给我们的那种政治经济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遭到否定,而且半个世纪来我们亲眼看到它停滞不前。这是本书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⑬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漠视,使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无能为力。对此蒲鲁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一片堆满建筑材料、等待建筑一座大厦的空地。工人们满腔热忱地等待开工,可是建筑师却不见了,也没有留下图样。经济学家们只记得每件材料的来历、加工的成本、材料的优劣,但是对于如何应用这些材料却一无所知。他们作了各种努力,试图找出建筑这座大厦的总图样,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他们绝望了,承认了科学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建筑社会大厦的事情就此搁浅,人们纷纷涌到工地上,将所有的建筑材料全部平分或抽签分掉。结果,本来可以建筑一座华丽庙宇的材料被无知和野蛮的所有权制度修成了一些茅棚草舍。^⑭蒲鲁东给自己的新经济学提出的任务,就是利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材料,找出纷繁芜杂的现象之后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改革社会,使人类社会真正达到消除贫困的“组织状态”。

政治经济学方法是蒲鲁东经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的哲学》特点之一,就是把方法视作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问题。在他看来,受特定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的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认识方法上奉行经验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科学理论只在于对经验进行描述和概括;“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⑮。在逻辑方法上秉承形而上学。经济学家们只承认形式逻辑的公式和规则,并使之绝对化。在对经济范畴的认识上,忽视范畴之间的联系性和运动性,“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⑯,将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视作永恒范畴。蒲鲁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不足。为此,他在《贫困的哲学》中,试图用一种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系列辩证法”。蒲鲁东认为,与三段论和归纳法相比较,“系列辩证法”的优越性在于“了解自己从何而来、去向如何和带来了什么。它所提供的结论,即使没有事前的证据和事后的证实,都始终是正确的,本身就是正确的,是自在和自为的正确的”^⑰。他强调,“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观念。这就是由三段论和归纳法的既对立又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变化无穷的原则。”^⑱这种方法不仅要求将事物的矛盾关系分别确定为一些观念,还要求有规律地把这些范畴加以归类、表示和系统化。这个规律就是“系列”。系列是“既复杂而又单一的机体”,它包括了观念的一切可能的分类方式,它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是理性的最高形式。任何事物,只有归入一定的系列,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而任何孤立的创造物、现象和原则,理性都是拒绝承认并加以否定的。因此系列是辩证法的灵魂:“确切地说,辩证法就是思想从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观念,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观念而形成系列”^⑲。

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借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只有把它们放在“系列”中认识才有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评价说:蒲鲁东“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蒲鲁东的头脑中引发过“风暴”,从根本上说他却是“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③

(二)

蒲鲁东以所有权为批判对象,切中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性维度,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什么是所有权》以清新的文风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论断在社会各界掀起轩然大波。这本书也给正处于思想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称《什么是所有权》为“机智的著作”,表示准备对其进行“不断的、深入的研究”^④。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也同样认为,蒲鲁东在“这本书用丰富的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私有制以及这一制度的后果即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在一本书中结合起来的作法,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⑤。

要想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必须了解当时的两个背景:其一,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动的规律,但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私有制被他们当成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经验事实。其二,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但都诉诸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把未来社会改造的希望寄托于有教养的人士身上。蒲鲁东以所有权为研究对象,切中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性维度。尽管他没有能正确解决所有权的实质问题,但是,不能抹杀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1865年马克思称它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⑥,认为“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权》。——引者注)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马克思这样解释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⑦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相比较,蒲鲁东是贫乏的;但是,贫乏的蒲鲁东在圣西门、傅立叶之后却起了某种划时代的作用。

蒲鲁东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与可能。在蒲鲁东的生活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但无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和让·巴·萨伊,都满足于对经济现象做“事实就是真理”的实证式解读,无意探询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蒲鲁东则认为,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对解决社会问题无能为力,就在于“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脱节”。他要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一个内在的理论结构。这样一种诉求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和可能。企图将黑格尔与李嘉图的思想结合起来,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当时只有蒲鲁东。但是由于他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特别是由于其非科学的历史观,蒲鲁东不可能完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更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在《贫困的哲学》中，一开始就声称：“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②“普遍理性”就是上帝，也就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蒲鲁东颠倒现实和范畴的关系，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观念的体现。他认为：“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③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在给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安年科夫的信中，大体确定了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大纲。信的开始就提纲挈领地指出：“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④就此而言，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⑤。

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化。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这并不妨碍辩证法家的巨大功绩。恩格斯称赞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⑥。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历史感正是法国哲学所缺少的东西。蒲鲁东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表于1843年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试图仿效黑格尔，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的新方法——“系列辩证法”。在《贫困的哲学》中，“系列辩证法”被应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可是由于蒲鲁东理论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实际上表现为对辩证法的庸俗化。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术语”，^⑦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个三段式。蒲鲁东无批判地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拿来各种现成的经济范畴，将各种经济范畴纳入他想象出的发展序列之中，并根据这种序列将经济发展分为若干阶段：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和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等等。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在谈到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时，不仅主观人为地编造出了这些范畴的逻辑系列，而且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和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人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⑧。在蒲鲁东的序列中，每一个范畴正是为消除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而为历史理性所创造的。通过这种办法他建立起了洋洋洒洒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虽然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⑨。

（三）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蒲鲁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并且每次评论都不尽相同。可见，蒲鲁东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缺失这一重要研究视阈，将会直接影响对马克思新世界观问世过程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和把握。

1842年夏天，马克思在回应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攻击文章中，首次

提及蒲鲁东。他指出：“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绝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⑧《什么是所有权》被马克思称作蒲鲁东“最好的著作”^⑨。马克思恩格斯将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作比较，肯定蒲鲁东不像“青年黑格尔”分子那样，热衷于追求“抽象的科学目的”，而是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向社会提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⑩；不是追求抽象的利益，而是追求“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⑪因此，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比之“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纯粹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要高明得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蒲鲁东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加以比较，认为《什么是所有权》对私有制度作出了“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批判性的考察。“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行无情的批判，足以表明“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⑫。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蒲鲁东与当时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作比较，指出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里，财产是被空想地废除了的。^⑬圣西门等人虽然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但往往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都没有深入到对资产阶级所有权批判的层面上。蒲鲁东第一次把私有财产称作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不仅流露出真实的激愤，而且将这种批判的对象确立为所有权，切中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性维度。

此外，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初步具有的“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在《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朦胧蕴含的有关“社会发展决定于经济规律，任意干预这一客观进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的观点；以及无神论思想，都对马克思产生过某种积极的作用。^⑭不仅如此，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还论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他强调指出：“人是一种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社会意味着各类关系的总和，总之就是体系。可是一切体系只能在某种条件之下才能存在。”“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所有权，它就有怎样的家庭、婚姻、宗教、民政和军事组织以及立法和司法制度”。^⑮他甚至提出，在进行社会研究时，“如果人们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结论的话”，就“应当是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⑯蒲鲁东的这些看法当然不是唯物史观的观点，它主要还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确实包含着研究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因素，对正处于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马克思而言，其积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什么是所有权》的肯定，主要是从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比较当中得出的，他们从中发现了当时流行的思潮所没有提供的新东西。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值思想转变期，有些对蒲鲁东的评价不尽准确，对于一些过高的评价，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了更正。尽管如此，蒲鲁东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的思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是有积极影响的。

马克思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时期，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即在此列），接触了被称为“正义者同盟”的工人团体，并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在从哲学高度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蒲鲁东思想的消极方面，对蒲鲁东的态度也转变为包含着明显批评与分歧的有所保留的肯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蒲鲁东把平等当成共产主义的政治论据，以及平等要求扬弃异化的观点。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旨在深入私有制内部，从而使“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

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这表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已经开始寻找原则上不同于蒲鲁东的现实历史基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蒲鲁东基于“平等观念是人类的本质”对所有权的批判所包含的缺陷。尽管马克思肯定蒲鲁东的批判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⑤。蒲鲁东开辟的崭新视阈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⑥。但是,蒲鲁东并没有能够变“可能”为“现实”。原因何在?马克思指出,“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矛盾关系上,蒲鲁东没能从根本上克服异化,而只是在异化的范围内克服异化。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却从这个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⑧为此,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主张废除所有权,这是他比以往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高明之处。但是,异化的核心不在于作为固定范畴的所有权。蒲鲁东提出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代替财产所有权,劳动的异化仍然是无法扬弃的。因为这个“个人占有”的社会基础仍然是资本和商品生产。“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物世界的重新争得。”^⑨

第二,蒲鲁东对私有制的认识不够深刻,他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看作私有制的形式。具体说来,他没把工资、商业、价格、货币等看作是私有制的进一步的形式,而是用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对经济学家们,甚至极力用这些形式来构建理想的未来社会。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把工资的平等看作是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这种肤浅认识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明确提出,工资是工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蒲鲁东认识不到,工资与私有财产是同一的,想要实现他所要求的平等,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主张细小改革的人”^⑩,而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家。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合写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者”时,特别提到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的所谓“系列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这一著作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 *dialectique sérielle*(系列辩证法),即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⑪《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⑫。理论分歧的加深直接导致了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写信邀请蒲鲁东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在回信中提出原则问题上的不同主张^⑬,在事实上拒绝了这一邀请。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关系作了进一步透彻的分析。

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具体阐述了他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昭示

了他与马克思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其时,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⑩,就是蒲鲁东。马克思总结性清算蒲鲁东的著作,就是1847年年初以法文写就的《哲学的贫困》。它与年底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一起,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⑪

注释: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5页,第296页,第135—136页,第136页,第139页,第340—341页,第59页,第377—378页,第4—5页,第240、381页。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蒲鲁东:《哲学的贫困》,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2页、第38页、第147页、第39页、第60—61页、第573页、第573页、第555页脚注、第5页、第147页。
-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7页。
- 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 ㉒⑳㉑㉒㉓㉔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5、58、55、55页。
- ㉖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 ㉘㉙㉚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484、298、277—278、232页。
- 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442页。
- 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 ㉟㊱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6页。
- ㊳㊴㊵㊶㊷㊸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1、39—51、42、39、38、52页。
- ㊺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9—80页。
- ㊻《蒲鲁东通信集》第2卷,巴黎,1860年,第166页。
- ㊼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7页。
- ㊾Jackson, J. Hampden, Marx, Proudhon, and European Soci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7, p. 62.
- 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
- ①其伟大历史意义和深刻理论内涵,可参见我们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的文章《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对〈哲学的贫困〉的解读》。

A Review of Proudhon's Economic Philosophy

FU Chang-yi¹, YU Yuan-pei²

(1. Shanghai Branch of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Proudhon's economic philosophy is the criticism of property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Based on property, Proudhon's economic philosophy reveals the critical dimension of criticizing capitalist and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The approach to social problems by combining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may give ris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s. But the basis of Proudhon's economic philosophy is still the historical idealism and Proudhon's dialectics is the vulgarization of Hegel's dialectics. The study of Proudhon's economic philosophy provid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Marx's thought.

Key words: Marx; Proudhon; economic philosophy; criticism of propert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海林)